



“蒙尘”之主

光 绪

张 博 © 主编

乱世君王

(下)

远方出版社

名家藏书

乱世君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蒙尘”之主书卷(下)
藏书章

主编：张博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毛毛陀

名家藏书·乱世君王
“蒙尘”之主——光绪(下)

编 著 者 张博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修订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45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660-X/I·262
总 定 价 96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六章 戊戌变法 (1)

第七章 寂寞瀛台 (120)

第八章 与珍妃的爱情 (149)

第六章 戊戌变法

—

中日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险。中日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一次大震动，大刺激，它向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宗法帝国，人们的观念长期来依附于以家族为单元的宗法社会的古老范畴。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的陈腐观念增添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因为受到传统文化惰力的重重束缚，其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在外部和内部的强烈冲击之下，才有可能使这个古老民族从长期沉睡中惊醒过来。中日战争对中国人猛击一掌，它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国人的近代民族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才明显地萌发出来了。

甲午战争败得太惨，日本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这次战争的对手，并不是英吉利、法兰西那样的超级大国，而是历来被中国人视之为“倭寇”的弹丸岛国日本。这就使得中国的各个阶级和各阶层感到震惊、愤慨和困惑。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在反省，都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何在。大风暴洗刷了空气中的污浊，人们的头脑显得格外清醒，视野更加清晰宽广，此时可以说是近代民族觉醒的真正发端。它的标志，一方面是战后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中国出现，代表资产阶级意识、观念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关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热烈地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去。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他们冷静地反省战争失败的症结在哪里？今后怎么办？是否还是同以往历次战争那样，随着战火烽烟的暂时平息，依旧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严酷的现实，作出了无情的答复，不行了！现在不行了！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对殖民主义者严重威胁。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难于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紧扣着中国人的心灵。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呼号呐喊，部分清朝官僚对国家命运产生无限忧虑，促进了光绪帝萌发维新变法思想。这是在塌天的亡国之灾即将临头的严重时刻，在漫漫长夜里闪烁出耀眼的曙光。

作为一朝之主的光绪帝没有因甲午惨败而灰心丧志，也没有因签订《马关条约》含恨受怨而消极后退，却是在失败中冷静反省，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进击，不做亡国之君。这就是光绪帝同他以前几位清朝皇帝品格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值得被后世称颂的

一个方面。他在《马关条约》换约的当天，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张之洞奏折的批谕中做了如下的表示：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怠，毋鹜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

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失败后的反省，其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态度是务实的，反映了战后光绪帝的思想面貌。

上面所述，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是一次大震动、大刺激。在这场大震动中，必然有人一筹莫展，消极颓废，有人在失败中猛醒，奋发进击，清朝走向何去？关键在于作为一朝之主的皇帝态度。安定人心，重新建树皇帝的权威，这是中日战争以后光绪帝首先所要反省的问题。安定人心之首要者是重整抗战派的士气，形成以皇帝为核心的近臣亲信圈子，进而增强对清政府整个官僚集团的凝聚力。为此，光绪帝于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向军机大臣等发了开诚布公的上谕，解释主战派提出的“废约”、“迁都”，“持久战”等积极主张未能实施的缘由，明确表示了战后积极进取的态度。

谕军机大臣等：日本覬覦朝鲜，称兵犯顺，朕膺怀藩服，命将出师，原期迅扫敌氛，永弭边患。故凡有可以裨益军务者，不待臣工陈奏，皆以主见施行。……

……乃尔诸臣工于所议章约，或以割地为非，或以偿银为辱，或更以速与决战为至计，具见忠义奋发，果敢有为。然于时局安危得失之所关，皆未能通盘筹划，万一战

而再败，为祸更难设想。今和约业已互换，必须颁发照行，昭示大信。……自今以后，深者愆尤，痛除积弊，……切实振兴，一新气象，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诸臣等均为朕所倚畀，朕之艰苦；当共深知，朕之万不得已而出于和，当亦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也。

在光绪帝周围的一些近臣中有人因中日战争的惨败而气馁，皇帝权威的失灵也使一些人寒心。光绪帝在谕旨中开诚布公，希望诸臣“深知”他的“艰苦”，“共谅”他出于万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的做法，坦诚之心公布于众，对于维系人心，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有句俗语所谓“皇帝不急急太监”，而光绪帝急人民之急，他告诫臣工“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战后的光绪帝颇有卧薪尝胆之心态，无疑是对于企望中兴清朝，而被光绪帝视为“所倚”的诸臣，是莫大的鼓舞。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光绪帝对清军从将领到士卒的腐败无能痛首恶疾，他在好几处的上谕中反省到这一问题。四月十四日的上谕指出：

朕办此事熟筹审处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又在四月十七日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里说：

何图将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统之任而愤事日深，予以召募之资而流民麇集，遂至海道陆路无不溃败，延及长城内外，险象环生。

封建社会的募兵制腐败不堪，导致流民麇集，尽是乌合之众，

这样素质低劣之士兵，在战场上必然是风声鹤唳，一挫即溃。更为严重的是募兵制之将帅把家族、同乡的宗法制度移植到军队建制，成了地方军阀和高级将领的私兵，曾国藩募湘军，李鸿章募淮军便是他们实力的基础。在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敢于抵制光绪帝的战略指令，除了有慈禧太后作为靠山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所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是他的私兵，唯李鸿章命令是从，只知李相而不知皇帝。殊不知，清朝军事制度的腐败，战斗功能的丧失仅是清朝封建统治制度腐败的一个缩影，这是作为清朝封建这段批谕，实制度的最高统治者的光绪皇帝当然是不可能反省到这一根本点子上去的，他只能从具体的，一个方面去反思，去考虑加以纠正与克眼，他反复指出，要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咸知练兵筹饷为今日当务之急”，尽管对练兵筹饷的“实力研求”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但总算涉及到制度的外圈，再深一层下去必将促使从制度上加以改革，所以改革军事制度也是后来戊戌变法中的一个方面。

《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成了全国上下同声唾骂的众矢之的，“疏弹合肥章以百计。”把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归罪于李鸿章一身，光绪帝也是这样反省的。六月初八日，李鸿章回京请安，光绪帝当面指责他“失民心，伤国体”，这样“词甚峻厉”的斥责，不仅指的是他没有在日本为拒绝割台而据理力争，而是对他在中日战争中一意主和，贻误战机铸成败局而发出的愤怒。李鸿章一意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成为战争失败的关键，这是历史事实。战前坐视日军在朝鲜布置阵营，占据有利形势而不采取相应对策，造成丰岛、成欢初战失利，战后平壤陷落、辽东败北；旅大拱手让敌，威海卫北洋舰队全毁。战局败定后，李鸿章竭力主

张向日本屈辱求和，不惜巨额赔款和割地签订《马关条约》，所有这一切确实是他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所铸成的结果。然而，李鸿章所以始终推行这一错误方针，并非偶然，一是为了保存他的政治资本——淮军和北洋海军，视军事为私事，结果碰上了凶恶的对手日本军国主义，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事力量尽付东流。二是，避战求和是慈禧太后在中日战争时期总的旨意，李鸿章在战争中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按慈禧太后这一旨意运行，所以平心而论，李鸿章还不能算是导致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掌握清朝最高实权的太上皇慈禧太后。战前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的是她。据考证这笔挪用总数达 1200 万至 1400 万两之巨，影响北洋海军 1888 年后未购一新船、未添一新炮。而日本当时拥有的二十一艘战舰，其中有九艘是 1888 年后新添购的，时速和炮火威力远胜中国海军，致使黄海激战时，败于敌手。战争爆发前后一心于寿辰庆典的筹划，力主避战唯恐寿辰扫兴的也是她。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光绪二十年的九、十月间，正是清廷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筹备和庆典压倒一切的重要时期。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岸正向旅顺逼进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大事做寿，京内外王公大臣、督抚疆吏贡献寿礼，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粉饰太平，极大地牵制和分散了清廷的精力和财力，涣散了军民斗志。九月初九日寿辰大典即将举行，官寿宫里演戏三天，从枢臣到部院京堂都要陪着她听戏，光绪帝对此极为反感。当天战情十万火急，光绪帝召枢臣指示战略，“审谕极急，并云不可早散，又云听戏三日，诸事延阁，仅可不到也。”后期力主屈辱求和的更是她。李鸿章官复原职，并召京面授机宜，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赴日本议和，都是由慈禧太后

抛开光绪帝而独自作出的决定，最后她还支使孙毓汶、徐用仪逼着光绪帝批准和约。慈禧太后是避战求和方针的最高决策者，而李鸿章则是慈禧太后旨意的具体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讲他遭举国唾骂，为众矢之的，是做了慈禧太后的替罪羔羊。光绪帝心里很明白，但又不肯公开谴责，这就是康有为所说的“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光绪帝的难言之隐，后来他在答复张之洞关于“迁都再战”的奏章中作了隐约的透露，他说：“廿余年来，慈闈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因为二十余年来光绪帝一直是西太后手中的傀儡，这次更是害怕“有惊”皇太后六十庆典，所以光绪帝只得忍气吞声，听任她的独断专行，他在战后的反省中粗浅地触及到了清朝全部症结的要害。

在甲午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作出一些重大决策时发生了分歧，清廷重臣要员都在主战与主和两大问题上亮了相，有的还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是一些原先附和主战的枢臣也在关键时刻倾倒在主和派一边。战争初期光绪帝调整了军机处班子，把它改变成为抗战联合阵线，在战争中发挥了指挥部和参谋部的积极作用。由于战争屡屡败北，军机处成员思想发生了动摇，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中枢机构为顽固派所把持，成了贯彻慈禧太后避战求和方针的策源地，光绪帝对中枢处于失控状态。战争结束以后，整顿军机处调整中枢班子是光绪帝反省过去，吸取教训的重要课题。军机大臣中对光绪帝抗战部署干扰最大，鬼点子最多的要算孙毓汶和徐用仪两人，他们一唱一和，压制主战派逼迫光绪帝，慈禧太后通过这两个亲信向李鸿章传递她的旨意，所以光绪帝在中日战争以后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把他们驱逐出军机处。光绪二

十一年五月给孙毓汶“病假”一月，“以徐桐兼署兵，部尚书”，先革去他的兵权，后又“称疾乞休”令他退出政治舞台，光绪二十五年孙毓汶快快死去，在中枢机构中拔去了一枚钉子。一个月以后，光绪帝又向徐用仪开刀，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乙酉：“谕内阁，吏部左侍郎徐用仪退出军机处，并毋庸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把他从重要岗位上撤了下来。在军机大臣中还有恭亲王奕訢和庆亲王奕劻，虽在后期倒向主和，秉慈禧太后旨意逼光绪帝签约，然逐出顽固派铁捍孙毓汶和徐用仪之后，这两位满洲亲王留在中枢暂时亦无大的威胁，所以未作更易。光绪帝在驱逐异己的同时，“命礼部左侍郎钱应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钱应溥其人，长期入值军机司务，笔下敏捷，“每承旨缮召，顷刻千言，曲当上意”，在中日战争时期他已任礼部左侍郎，“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光绪帝慧眼识才，把这样一位有才气而又能直言的廷臣不仅提拔任军机大臣，而且“再迁工部尚书”加以重用，无疑增强了帝党力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军机处决策，“总署”贯彻，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李鸿章及慈禧太后的亲信所把持，光绪帝的亲信成员几乎无人涉足，经过中日战争的反思，光绪帝为了加强对“总署”的控制，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把两位最忠于皇帝最得力的重臣进入“总署”，今后内政外交的各个脉络君权皇命不致梗塞，光绪帝的谕旨可得以畅通。至于李鸿章虽然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对他的两次处分都被慈禧太后一次吹掉。战后又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派往俄国，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是时还秘密地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光绪帝在

李鸿章身上饱含怨恨,并对他有所限制不可。李鸿章集军、政、外交于一手,又有慈禧太后为后盾,故对他的权力限制,光绪帝采取十分慎重的处置办法。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8月28日),“命李鸿章入阁办事。调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王文韶在中日战争期间,他的立场基本上倾向主战,在签约关键时刻,态度也无突出表现,然王文韶其人颇有外交、理政之才能。故光绪帝以王代李,把李鸿章调离天津留京入阁,实际上是名升实降,一定程度上削去了他的部分军权和外交之权,但一调动也为李鸿章同慈禧太后的直接联络提供了方便。为了削弱李鸿章的影响,光绪帝即着上谕王文韶整顿直隶地方。

直隶地方,积弊已深,凡吏治军政一切事宜均应极力整顿,至外洋交涉事件,尤其紧要,如从前有办理未协,应行更改之处,务当悉心筹划,不避嫌怨,因时变通,……洗从前积习,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这道谕旨,要王文韶“不避嫌怨”,“洗从前积习”,很显然是针对李鸿章而发的,实际上全盘否定了他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内的“政绩”,这不能不是对李鸿章的一个重大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讲,比过去对他两次处分更为有力,为以后剪除李鸿章势力埋下伏笔。

甲午战后,光绪帝犹如在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从反省中得到有益的教训;从反省中理顺思路振作精神,充实了他的抱负,为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那出有声有色的维新变法活剧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二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国人民投入更深的苦海，四万万同胞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此时此景，正如谭嗣同在诗文中描绘的那样：“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然而，中华民族在“齐下泪”的悲愤中觉醒起来了，图存救亡的意识与日俱增。空前高涨的爱国呼声惊动了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时势所逼”，“国事艰难”，纷纷向朝廷“竞言自强之术”。洋务派所陈“自强之术”仍以“洋务救国”为宗旨，以“开矿、练兵、筹饷、通商、制械”为要务。可是也有一些官僚，他们陈奏“自强之术”，突破了洋务派已经鼓吹了二十余年的“自强新政”框架，向着维新变法贴近。最先以日本明治维新和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鼓励清廷变法的是顺天府尹胡橘菴，他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上了一道题为《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的奏折，其主要内容是：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

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然时势所逼，无可如何，则唯有急求雪耻之方，以坐致强之效耳。昔普法之战，法之名城残破几尽，电线、铁路处处毁裂，赔偿兵费，计五千兆佛兰克，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然法人自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求治，从前弊政，一体扫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强，仍为欧洲雄大之国。……今中国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余）兆之民，所失陷者不过六七州县，而谓不能复仇洗耻，建我声威，必无是理。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驾欧洲，旧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

纵观世运，抚念时艰，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高谈理学，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习于便安者，又以为和局已定，泄沓相仍。……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富强之术。用敢不揣冒昧，就管见所及，举筹饷练兵，重工器，兴学校数大事，敬为我皇上缕析陈之。……

胡橘棻认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力行西法是清朝惟一的“富强之术”。他所奏的具体仿效内容虽然仍是开铁路、筹钞币银币、开民厂以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等洋务范畴，然而，他赞扬明治维新，仿行西法，并向光绪帝提出：“一心振作，破除成

例,改弦更张,咸与新法”的变法要求,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确有一些官僚已经萌发出朦胧的维新变法的新思想。

其时,刑部侍郎李端棻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上了名为《请推广学校折》的奏折,他从办学校这个侧面,向光绪帝提出了维新企图,这是清朝官僚中典型的从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变法图强思想。他在奏折中说:

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而臣顾谓教之道未尽,何也?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

……在李端棻看来,洋务派兴办西学,治标不治本,“治国之道,富强之原”均未“肆及”,所以他在奏折中提出;设官书局于京畿,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个方面,“有官书局大学堂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尽管李端棻的教育思想还深深地保留着洋务教育的痕迹,而他的主张已向近代学校靠近了一步。由于萌发出维新思想,所以他后来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并向光绪帝推举,成为维新派同清廷建立联络的媒介。

知识分子阶层中,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维新变法的热潮也澎湃掀起。“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正象著名史学家陈旭鹿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甲午战败是对“维新运动的动员,而《马关条约》也可以说是动员令。”不久就掀起了知识分子的《公车上书》运动,他们作为一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处在“卧薪尝胆”苦境中的光绪帝，“甲午、乙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甲午兵败促进了光绪帝政治思想的新转变，在这以前，光绪帝初登皇位，其主要精力放在熟悉处理朝政事务，考察臣工的办事效率。虽然对慈禧太后的严密控制极为反感，但基本上还是“小心翼翼”地在皇太后手掌上做傀儡皇帝，对于“垂帘听政”时期的既定方针不敢有所逾越和偏离。尔今，光绪帝经过甲午战争的洗礼，中兴祖宗基业之心更加强烈了。继甲午之役以后，赔款割地，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豆剖，亡国之君的危险日复一日地向他逼近，因而在他的思想上奋起了难以抑止的“图强雪耻”的紧迫感。美国作家卡尔女士对甲午战后光绪帝的心态有过生动的叙述：

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辱。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

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光绪帝连连发出上谕，要求臣工“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并表示“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他所说的实政，具体的就是“修铁路、铸钞弊，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等等，“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光绪帝的“图强”观和寻找的“雪耻之方”仍在洋务派“自强新政”的圈子里。所以甲午战争以后，光绪帝对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和民办企业备加关注，以推进洋务运动的新发展。

光绪帝政治思想发展的新起点是在运用洋务手段图强的同时，萌发了维新变法的意向。他维新变法思想的萌芽，是受到朝野